

一个记者

笔下的

文化人

赵兰英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赵兰英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文化人

一个记者 笔下的





1995年3月25日，巴金出席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第九次会议开幕式。



1998年4月22日，贺绿汀在第四届上海文化艺术奖晚会上(左为张瑞芳)。



1995年2月13日，少年儿童出版社为陈伯吹庆祝九十岁生日。



1998年沈柔坚(前中)与周小燕、孙道临等艺术家在一起交谈。



1998年钱君匋在海宁出席“钱君匋艺术研究馆”开馆仪式。



1997年7月，余秋雨与夫人在观看牛群摄影展。

1995年3月，茹志鹃和女儿王安忆合影。





1996年2月，上海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人士迎春座谈会上，陈至立与白杨合影。

1996年阿兰·德隆与著名电影演员秦怡、“佐罗”的配音者童自荣在一起。



1994年3月16日，刘海粟艺术大师在上海为他举办的百岁庆典活动上。

自序

没有像通常那样，在一部书稿出版时，请名家写篇序文。思前想后了许久，倘若有名家写序，画龙点睛一番，也许会增色不少。然而，能够排印在这里的文字，每一个都是一份情感。在长达20余年的记者生涯中，我与文化名人交往，尤其是巴金、贺绿汀、陈伯吹、赵家璧等大家，每一回心灵都有一番撞击、升华。我将这些感受，通过我的笔，传递给读者。因此，可以说，每一篇是对文化名人的赞歌，也是自己情感的流露。平实地、真切地将这些写来，对于读者更是一种真诚。

之所以将第一辑取名“珍珠滩”，是因为这些篇什都曾经发表在《瞭望》杂志珍珠滩栏目里。还因为，这里所写的都是名家们身上最具光彩或最有特色的地方，而这些是最可珍贵的。《巴金的记性》、《于伶的“迂”》、《贺绿汀的犟劲》、《陈伯吹的童心》、《谢晋的爱心》……凡28篇，记述了28位名家独有的风采。能够发现或者说概括出他们的特点，绝不是采访了一二次，更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是无数次接触，与他们敞开心扉

自序

地交谈，从他们的言与行中，深切地感受出来的。第一次采访巴金先生是在1980年，而这篇《巴金的记性》却写于1988年。这其中，我几乎年年都要在他那儿小坐几回。常常，都要碰到来探访他的老朋友。每一次说起过去的一幕幕，别人都有记不清的地方。而唯有巴老，总能清楚地说出每一个细节，乃至时间、地点。我在羡慕和感叹巴老记忆的同时，深深感到，他的记忆来自他的真诚。任何一件事只有真诚地对待过，才不会遗忘。真诚是巴金之所以为人崇仰的根本点。记得《贺绿汀的犟劲》发表时，贺绿汀正患病住院。那天，他的女儿捧着文章念给他听。这时护士正给他梳头，那一头白发直往上翘，怎么也梳不平，便笑道：“写得好。真是犟得不得了，连头发都这样。”大伙“哄”地笑了起来。贺老自己也按了按往上翘的头发，笑开了。著名作家袁鹰先生在读了《于伶的“迂”》一文后，专门来信表示赞赏。袁鹰是于伶的老朋友，1994年他的专著《长夜行人——于伶传》出版。袁鹰先生在此书的最后一章，将这篇文章全文引进去了，他写道：“记者这篇文章不长，却是于伶晚年生活和心境的生动写照。”

在众多的篇什中，《毕修勺的左拉情》、《杨维廉的“晦气”》不能不记。年轻一代读者对于毕修勺这个名字也许已经陌生了。但他却是第一个将左拉作品翻译过来的作家。在他的生命旅程中，他本可以做大官，也可以发大财，他却统统舍弃了，却选择了翻译左拉作品的道

路，而这条道竟然是那么艰难，那么曲折，那么辛酸。他一本本地翻译，一本本得不到出版。堆成小山似的译稿，有的变脆，有的被虫咬，他的心在流泪，在痛哭。但是，他没有停笔，直到生命的最后。稿件发表后，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北京一家刊物总编来电，说很感动，希望再充实一些材料，他们杂志再度刊登。山东有一家公司老总，在读了《瞭望》上的这篇文章后，决意要了却毕先生的心愿：出资出版先生的译作。两年后，我收到先生之子毕克鲁寄赠的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黎》、《罗马》、《卢尔特》。出版者在“前言”有一句感慨良多的话语：“这是一项有苦难言的工程，然而工程的实施毕竟已经开始了。”

去年年底，上海博物馆召开青铜器技术鉴定会，采访专程来沪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华觉民。互换名片后，华先生慎重而又笑问道“你是不是《杨维廉的“晦气”》一文的作者？”我说：“是呀。”他马上说道：“你写得好，声张正义。我和杨维廉是同乡，又是同学。他是一个懂5国语言，极有才华，极有思想的人。可惜啊，得不到重用，英年早逝。”我写作这篇文章还有一个过程。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施觉怀先生是一个极有正义感的老知识分子，他与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戴青天”之誉的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通信，介绍了杨维廉的一些情况。老戴义愤填膺，与《瞭望》编辑、著名随笔杂文家陈四益先生商议这事。陈四益先生先给我来电，

自序

希望用一种比较巧妙的办法，将这件事“捅”一下。第二天，戴煌又来电，用他的大嗓门喊道：“太不象话了，一定要揭露。兰英啊，我们一定要做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为他们叫冤。这件事就拜托你了。”这样，我开始了采访。《杨维廉的“晦气”》一文发表后，很快被《报刊文摘》等报刊转载，影响非常大。时至今天，仍有人写信反映“杨维廉现象”。

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也许都有这番体验，短文不见得比长文好写。余秋雨先生曾说起他的那些“文化大散文”，虽然每篇不过二三万字，但写得很苦，所用之力超过自己以往所写的几十万字的著作。而收集在这里的绝大多数是新华社曾经播发过的“新闻统稿”，它的篇幅更不可能长了。在有限的字数里，写好一个人，这就成了我所追求的目标。力求以一种清新的笔调，给人以一种阅读的美感，这是在行文上的刻意。力求以多个细节的描写，给人以一种情感的震撼，这是在新闻艺术化上的尝试。力求以一个最为恰当的主题，给人以掩卷后的感悟，这是在思想上必要达到的。第二辑“心路园”和第三辑“缤纷地”，可谓是这种追求的结晶。前者为2000字以上的“长文”，后者则是千字短文了。《一言难尽陈六弟》是写上海一位青年既当作家又做生意的故事，全文仅1000多字，但写得轻松活泼，可读性，思想性俱佳。有一篇评论这样认为：此文当是新闻中的“作品”，不可多得。白杨去世后，我去采访。她的旅居日本儿子见

了我的名片后，说道：“噢，你就是赵兰英。几年前你写过一篇《白杨礼赞》，是将我妈妈一生概括得最准确最生动的一篇。”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责任编辑王国伟也曾对我说：“你写的余先生的《播种文明》一文，余先生讲是所有写他的最好的一篇。”

《一笔曾当百万师，手不停椽至去时》，这是我在老报人赵超构先生去世时撰写的一篇通讯。记得有一天我到医院看病，在窗口取药，递上处方时，司药员抬起头小心地问道：“报上有一篇写赵超构的报道，是不是你写的？”我点了点头。他立即兴奋起来，说道：“写得真好，好多年看不到这样好的文章了。”上海博物馆有一位搞宣传的同志，那天回家后妻子对他说：“今天报上有一篇写赵超构的文章，漂亮极了，你好好看看。”妻子问道：“这位作者也姓赵，大概是赵超构的亲戚吧？”他回答说：“不是的。赵兰英我认得，从来没有听她说起过。”妻子又说：“你怎么晓得他们之间没有关系。不是自己的亲人，哪能写出这样感人的文章。”后来，朋友把这事告诉我，还特意追问一句：“你到底与赵超老有没有关系？”我笑道：“如果说有关系，那么 500 年前是一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五辑“星河祭”中的每一篇，都可以说出类似的“故事”。从采访文化名人到成为他们的朋友，到他们不幸谢世，这一感情经历总有那么几年、十几年。文如其人，从这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我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每一回听到他们的噩耗，我总是很激

自序

动，身不由主地颤抖，哀叹他们的不幸，无奈老天的无情。我将我的情我的爱，倾注在笔端，感染给我的读者。一个作者不为他所写的人物感动，那么是不会写出感动他人的文章的。今年夏天，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沈柔坚在参加新闻界一次活动中，突然倒地病故。有关领导去探望家属，询问还有什么要求？沈先生的夫人就提出：“能不能请新华社的赵兰英同志写一篇报道。老沈生前最爱看她写的报道了。”我“受命”采访时，先生夫人说：“你的稿件与别人不一样，你是用心在写，有感情有文采。”《不言一樽酒，明日难再持》写的是漫画家张乐平先生故世的通讯。从供桌上一坛绍兴加饭酒，到先生一生与酒的关系，到他的朋友将酒洒在送别会上，全文一气呵成。有多篇评论文章，给以高度赞赏，认为情景交融，催人泪下。记得有一篇是复旦大学吴万里同志写的，发表在陕西一家新闻刊物上。看到这篇文章时，我对吴万里这个名字想了好久，不知何许人也。以后吴万里同志来电邀请去复旦讲课，我不善言谈，并患有多种疾病，不宜演讲，便婉言拒绝了。吴万里的这篇评论文，题为《情也绵绵意也绵绵》。

今年夏天，我两次去杭州，探望在那里休养的巴金先生。杭州的美，尽人皆知。每天，或清晨，或黄昏，他都要在家人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西湖边转一圈。95岁高龄的巴金，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面旗帜。他的人品、文品，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尊重和仰慕。年迈多病，使他

有口难言，有笔难写，有情难表。我随同左右，望着轮椅上沉默着的巴金，心如西湖水不能平静。巴金是不朽的，他的作品人品恩泽了一代又一代人。他的功绩，将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延续。“巴金赋”辑中的这几篇，是我在近几年人们祝贺他生日时采写的一些零星镜头。但多多少少是对这样一位文坛巨人的一个方面的记录。这里有他的情感，有他的思想，有他的生活。而《一代文学大师——记巴金》一文，则是我对巴金一生的简要概述。比起他的文学成就，任何写他的文章，哪怕是研究专著，我想都是苍白的。但这毕竟是一位后学者、追随者、宣传者，对他的绵薄回报之处。相信，读者会有共同之感，并爱上这些篇章的。

写文化名人，其实是一个学习文化名人的过程。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以他们的文品，更以他们的人品，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每一次采写，如同痛饮一次甘霖，我的心灵得到净化。我不奢想什么，不求报什么，更不望得什么，唯一想的就是好好利用手中的笔，再为这些值得我歌、我赞的人写些什么。也算是为这个社会的文明，再添些砖瓦。

赵兰英

1998年11月3日

目 录

一、珍珠滩

巴金的记性	(3)
于伶的“迂”	(6)
贺绿汀的犟劲	(9)
陈伯吹的童心	(12)
谢晋的爱心	(15)
杜宣的后劲	(18)
赵家璧的“长命书”	(21)
朱屺瞻的“瞎塌塌”	(24)
张乐平的情义	(27)
闵惠芬的“工作狂”	(30)
沈柔坚的柔与坚	(33)
陆谷孙的酒脱	(37)
柯灵的顶真	(41)
钱君匋的奉献	(44)
毕修勺的“左拉情”	(47)
袁雪芬的硬气	(50)
杨维廉的“晦气”	(53)

目 录

褚钰泉的尽心	(57)
傅全香的痴情	(60)
陆诒的谦恭	(63)
谢稚柳的眼光	(66)
陆威的“威”	(70)
俞天白的脚步	(73)
程十发的境界	(77)
马承源的魅力	(81)
罗竹风的辞书缘	(85)
夏振亚的激情	(89)
李可染的印章	(93)

二、心路图

播种文明

——访余秋雨教授	(99)
----------------	------

眷眷深情

——访女作家菡子	(103)
----------------	-------

“我是党的作家党的人”

——访新近入党的剧作家沙叶新	(108)
----------------------	-------

戴厚英访港归来一席谈	(113)
------------------	-------

陈继光和《新浪潮前奏曲》	(116)
--------------------	-------

我尽我心 我尽我力

——访著名作家、学者施蛰存	(119)
---------------------	-------

写作：生命意义的反映

——访作家叶辛	(122)
---------------	-------

儿女情长茹志鹃	(125)
---------------	-------

文化当启发民智

——访著名学者王元化·····	(128)
《于无声处》写真情	
——宗福先忆当年·····	(131)
为了这一份责任	
——访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	(134)
从穷苦娃到总编辑	
——记丁法章·····	(136)
胡万春越南“下海”记·····	(148)
人民关心着她	
——记著名演员杨丽坤·····	(154)
白杨礼赞	
——记白杨从影 60 年·····	(156)
秦怡“跑龙套”·····	(162)
瑞草芳华八十载	
——记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	(164)
农村影片专业户——赵焕章·····	(173)
伏枥仍存万里心	
——记谢晋与谢晋恒通影业公司·····	(176)
夕阳正红	
——访电影艺术家孙道临·····	(179)
党委书记的榜样	
——记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马林发·····	(183)
杳然天界高	
——记著名音乐家贺绿汀·····	(185)
“第一交响曲”	
——指挥家曹鹏的“作品”·····	(188)
心与心的呼唤	

目 录

——访司徒汉夫妇·····	(191)
请理解和尊敬他	
——记外国歌曲翻译家薛范·····	(194)
“八音之领袖 诸乐不可比”	
——听李民雄谈鼓文化·····	(199)
元元之圆圆·····	(203)
在人生舞台上	
——记云南省京剧院院长关肃霜·····	(211)
一代宗师俞振飞·····	(213)
不屈的傅小石·····	(220)
李献敏重访母校·····	(224)
台湾名票罗吟梅在上海·····	(228)
洛林·马泽尔沪上执棒·····	(232)

三、缤纷地

一言难尽陈六弟·····	(239)
茹志鹃和她的女儿·····	(242)
生活的馈赠	
——诗人罗洛、白桦扬州行·····	(245)
崇尚“建设”的王国伟·····	(247)
鼓励一本书主义	
——孙颀谈长篇小说创作·····	(249)
情趣·个性·审美	
——演员周洁漫谈服装·····	(251)
才旦卓玛在上海·····	(253)
亚洲音坛的盛会	
——访'91上海亚洲音乐节国际评委谷建芬·····	(255)